

名 刊 观 察

# 《自由中国》的刊行 与台湾自由主义思潮的演进

● 贺昌盛

战后台湾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其本土政治或经济发展过程中自行生发的思想潮流,甚至在更大的范围内讲,自由主义本身就不是汉语语境自身所生成出来的思想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中国自由主义的诞生与发展带有明显的外源性与移植色彩。

具体到台湾而言,自由主义思想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由 1949 年大陆迁台的知识分子所携传的自近代中国至“五四”以来所逐步形成的自由主义倾向,二是由于台岛知识分子与欧美思想界的持续交流而不断输入的自由主义理论。前者是台湾自由主义思想的根基,后者则是其进一步的拓展与延伸,这其中,由日据时代所逐步滋生起来的台湾本土的自由民主因子也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土壤。而贯穿于整个 1950 年代的《自由中国》杂志则是台湾自由主义最为集中的大本营,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胡适、殷海光、雷震、夏道平、瞿荆洲、傅正、徐道邻等等。《自由中国》的每一期上都在首要的位置刊登着它的四条言简意赅的“宗旨”,其第一条就是:“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这可以看作是《自由中国》经年坚守的最为根本的目标。从 40 年代末到 50 年

代初期台湾的现实境遇上看,由于“二二八事件”对台湾社会整体性的重创,台岛本土的知识分子已普遍陷于沉默,加之国民党政府所秉持的“三民主义”,因其军事上的失败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知识分子既有的支持与信任,此一时期的台湾实际上是处于思想的“真空”地带的,这就无疑为自由主义在台湾的输入与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契机。当然,《自由中国》在确立自己的“宗旨”时,仍然把“反共”作为了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自由中国》所理解的“反共”却与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复国”有着并不完全一致的内涵。因为它最终所希望实现的是一种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社会”,而并不是国民党政府所初步构建的那种所谓“民国”模式;换言之,自由主义所针对的批判对象是包括苏俄的“铁幕”政治在内的一切专权形态,而由国民党政府所实施的政治高压也就同样必然地会成为其所攻击的目标。所以,《自由中国》在草创时期对于“反共”思想在内涵及外延上的这种置换,其实完全可以看作是台湾自由主义在初生之时以保证其基本生存的某种必要的策略。事实证明,一旦《自由中国》逐步挑明了自己最终的政治立场,即同样将国民党政权视为专制体制之一种时,它的所谓“反共”就不再会讨来国民党政府的欢心。

甚至相反,它会被政府视为一种狡黠的手段而招来更为严厉的打压。在经历了草创初期的策略性迂回之后,《自由中国》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必须比其他刊物背负更大压力的沉重境遇。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它自身的特立独行的品质及其远远超越于现实政治的开阔视野,使它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赢得了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和支持,这无疑也为它自身换取了相当的现实生存的资本(国民党政府迫于普遍舆论的压力在短时期内将只能限制其言论而不可能直接彻底取缔它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了《自由中国》的顽强坚守,自由主义在台湾才能真正打下牢固的根基。

《自由中国》杂志创刊于1949年11月,由胡适担任总发行人,雷震任主编,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等人则是其中的骨干。该杂志于1960年9月因雷震案而被迫停刊。作为一份与国民党官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刊物,《自由中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既有协作又有对抗,有学者曾将其彼此的关系划分为交融期、摩擦期、紧张期、破裂期 and 对抗期等五个阶段,<sup>①</sup>但在根基上,强调“思想自由”及其与“极权意识”的对立却是其始终坚持的核心主张。总的来说,《自由中国》是一个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核心诉求的综合性政论刊物,其刊行基本上贯穿了整个1950年代,所以,它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上世纪50年代台湾思想文化发展的某种浓缩。《自由中国》杂志的文章在整体上大致可以划分为“宪政”(含自由主义基本政治理念的阐发、宪政思想的理论架构,如争取言论自由、外交、政党政治与选举等)、“民生”(对各种具体现实问题,如教育问题、公民生活待遇、各式民生政策的抨击与建议及海外时政信息等)和“文艺”(含文学作品、书刊评介与文学研究等)这样三个大的版块。这其中,“宪政”部分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也可以看作是《自由中国》杂志自身独有的特色。

## 一、《自由中国》的酝酿与创刊

《自由中国》明确标注的创刊时间是1949年11月20日,但其此前的酝酿却经历过一番曲折。就胡适而

言,创办《自由中国》一方面有承接《努力周报》(1922年5月-1923年10月)和《独立评论》(1932年5月-1937年7月)之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意图,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从文化与宣传的角度协助蒋系政府以解决当时国内的政治危机。但时局变化之快完全出乎人们的想象,国民党军队自徐蚌会战以后迅速全面溃退,接着北平易帜、政府南迁广州,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下野、李宗仁代理政务,几乎在一夜之间,国民党政权就已经走向了瓦解的边缘。尽管如此,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仍然坚持认为,国民党政府在其军事力量及国际舆论等方面尚居于优势,特别是国民党高层在一定程度上也还具有相对的凝聚力,所需要配合的主要是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协作。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初步设想之下,以胡适、王世杰、雷震、傅斯年、杭立武等人为主的拥蒋派知识分子才聚集到上海,开始协商以言论扭转民意,以重振国民党士气的有关事宜。

据雷震回忆说:“我们数度交换意见的结论,认为和共匪斗争,必须在思想上能有所立,从心理上建立反共信念,把反共精神振作起来,则反共始能有效而可以获致最后胜利。所以,必须创办言论机关,发行报纸或定期刊物,和共匪作思想的斗争,从理智上建立反共信念,从心理上击破共产党。”雷震本身即是国民党高层的核心人士,曾直接参与过《中华民国宪法》的制订,又是蒋系政权的重要政治幕僚,王世杰也曾出任国民政府法制局的局长,杭立武不久也在胡适的推荐下就任教育部长。所以,《自由中国》的创办从一开始就带有由官方倾力支持的色彩,这一点与胡适此前创办《努力周报》及《独立评论》时的相对比较纯粹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稍有不同。事实上,该刊在创办之初的经费来源也主要是国民党政府(杭立武就任教育部长后确定由教育部按月补助刊物两百美金,且后又增至三百美金,1950年又改为一次性补助新台币一万元),这也是促使初创时期的《自由中国》必须与国民党政权密切合作的重要原因。至于刊物的形式,雷震最初主张办报,以最快的资讯信息去影响人们对于时局的判断。胡适则认为既然要宣传一种思想,总需要利于读者的恒久

保存与反复阅读,报纸则虽有时效却不利收藏。雷震最后决定先在上海办成日报,刊名由胡适仿法国戴高乐创办《自由法国》之意被定名为《自由中国》。胡适在奉命前往美国的海路上草就了四项宗旨,后成为《自由中国》的创刊宣言并每期登载,这四项宗旨是:“(1)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2)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3)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4)我们的最后目标是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刊名及宗旨既定,国内局势却急转直下,由于国民党长江防线被迅速突破,雷震也不得不匆忙迁台湾。在处理完转迁的杂务之后,到1949年10月,雷震才在杭立武的提醒之下,重新邀集起傅斯年、毛子水、王聿修、张佛泉、夏道平、罗鸿诏等人商讨,并正式确定开办《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拟定为胡适,社长及总编等职则分别由雷震、毛子水担任,编辑委员会成员计有:毛子水、王聿修、申思聪、李中直、杭立武、金承艺、胡适、夏道平、殷海光、许冠三、崔书琴、黄中、雷震、戴杜衡、瞿荆洲、罗鸿诏等,具体事项则基本上由雷震全权负责处理。在集聚了相当数量的大陆迁台知识分子精英之后,《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刊号终于在1949年11月20日正式出版发行了。

## 二、策略性的合作(1949-1951)

创刊伊始,因为有着政治权力的大力支持,加上知识分子的广泛响应及刊物本身的评论力度与开阔视野,《自由中国》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台湾各界甚至海外华人的积极肯定。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当然与胡适等人自身所具有的影响力,以及刊物的主笔们(许冠三、殷海光、雷震等)的思想和知识水准有着很大的关系。在《自由中国》发行的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刊物与在台的政权之间几乎一直保持着蜜月般的关系,

这首先是基于《自由中国》初期的坚定的“反共”立场以及“自由”理念本身对台湾及海外知识分子的广泛号召力,它事实上已经从文化宣传的角度给予了台湾国民党政府以充分的协助和支持。但从根本上讲,这种现实层次上的合作却并不是《自由中国》创办的终极目的,因为集合在此一刊物周围的这群知识分子最终是希望通过刊物传达出真正自由主义的声音,而不是成为政府单纯的政治传声筒。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中国》与政府的积极合作应当是有其策略性的用意的,而此一策略又几乎与胡适当年创办《努力周报》及《独立评论》如出一辙。所以,从温和地协作到成为政府的“诤友”,直至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传播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差不多可以看作是《自由中国》渐次发展的必然之路。

除此以外,1950年代整个国际时局的变化也是导致《自由中国》开始逐步跟政治权力分离的重要因素。自二战结束以后,以苏俄及英美为主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一直都在忙于划分和扩展自身的势力范围,从亚洲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来看,中国事实上也一直一直是两大阵营彼此争夺的主要对象。随着国共和谈的破裂及国民党政权在军事上的全面溃败,作为强力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美国已经逐步从密切的盟友转向了对中国局势的观望——只要能够借助中国封堵住苏俄的势力扩张,美国人其实并不在乎中国的政权最终会被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所掌握(美国在派员访问延安之时已经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所以在1949年8月5日由美国国务院所公开发表的《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3573)中,美国对于国民党政府不留情面的指摘,就已经实际地将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放置在“悬搁”的位置上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则正式宣布不干涉中国内政,这就意味着“台湾”真正成为了一个“悬而不决”的特殊地区。此一时段风行台岛的种种“联合国托管论”、“台湾地位未定论”等等言论无疑给国民党政府带来了巨大

的困扰。政府之所谓“反共复国”在此时也成为了只能由国民党政权单方面实施的一种构想,它已经无法获得国际力量的支持。而在韩战爆发,美国重新制订出以日本、南韩及台湾为前沿以抵御大陆中国的亚太战略以后,台湾一时间似乎又有了转机,台湾国民党政府也仿佛又看到了希望,但事实上,整个世界从这个时候开始才真正进入了漫长的冷战时代。从“翘首以盼”到“悬而未决”再到“无限期等待”,台湾民众与知识分子在一个短短的时期内,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情感激荡,由此而引发的对于国民党政权之“反攻大陆”的可能性的怀疑也自然就在所难免了。

从《自由中国》最初两年多的政论来看,集聚在这一刊物周围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在关注着时局的变化,虽然其反共的论调未曾降温,但也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政论已经从那种鼓劲打气式的宣传在逐步转向对于两岸处境及冷战国际新秩序的冷静分析和思考了。而暗地里所透露的其实是知识分子对空洞的“复国”心态的普遍疑虑,以及对台湾日益加剧的党治形态的反感。随着美国对东亚局势态度的日益明朗化,台湾最终被确定为堵截中国大陆的前线,并于1954年年底被正式纳入了美国在亚太地位的整体防御体系之中,进而成为了冷战世界格局中隶属于美国的一方。有了这样一种微妙的变化,台湾重新从美国寻找到了强大的经济与军事支持,蒋介石也开始揽一切权力于一人之手。1950年代初期的那种由于短时间的混乱及国际局势的摇摆所导致的相对的宽松环境,几乎又再次退回到“二二八事件”以后的严酷状态。这对于立愿在台岛推行民主和自由的知识分子们来说,不啻为一个沉重的打击。事实证明,自由知识分子与专权政治之间的鸿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弥合的,《自由中国》在经过了与现实政治短暂的妥协之后,必然将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现实政治本身。

### 三、政府的“诤友”(1951-1956)

《自由中国》与蒋系政权的正式分裂首先应当追溯到1951年夏道平的一篇《政府不可诱人入罪》(《自由中

国》第4卷第11期)的文章的发表,台湾国民党政府为整顿金融秩序曾颁布了严格的金融管制禁令,而国民党保安司令部竟然设计出种种诱人入罪的伎俩以求获取破案的高额奖金,夏道平的文章即是针对此事予以了公开的揭露和抨击。此论一出,整个社会一片哗然,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度自然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夏文虽然极大地扩展了《自由中国》在普通民众中的广泛影响力,但也因此为《自由中国》招来空前的危机。由于文章所针对的是一个有着绝对权力的军事部门,《自由中国》杂志社同仁曾一度几乎遭遇到来自特务及当局的武力威胁。后经雷震出面,借助其与政府高层的关系以彼此妥协,双方才商定平息此一事件的办法,即由《自由中国》在随后的一期重刊文章《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第4卷第12期),以申明政府部门在执行政策之时个别行为的不当与粗糙纯属难免,但希国人体谅云云,由夏文而引发的首度危机才算得以化解。

然而,此事在《自由中国》内部却并未中止,作为发行人的胡适虽远在美国,但得知消息后却极为愤怒,他并不认为《自由中国》的妥协是对杂志本身的保护,相反,这恰恰证明了公民之言论自由已经被横加干涉。胡适据此致函雷震,要求辞去发行人一职。胡适认为:“《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名义,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人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胡适的来信被刊登在本年《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上,这一举动再度引起了台湾国民党政府的不满,雷震也因此被台湾政府视为需要被管制的对象。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自由中国》与居台政府之间的冲突和摩擦接二连三地发生了。1952年9月徐复观发表《计划教育质疑》(第6卷第9期)批评台湾政府的教育政策,在随后一期的社论《对于我们教育的展望》中,批评的目标直接指向了筹备中的青年救国团,当局军中政治部首次下令在全军范围内查禁《自由中国》杂志。次年3月,雷震被解除政府国策顾问的职务,不久,

王世杰也从秘书长的位置上去职,此后,雷震又在1954年年底被彻底注销国民党党籍,《自由中国》的官方背景正式宣告结束。但也因此,《自由中国》对于政府及时的抨击反而大大加强。先是在“读者来信”栏中对国民党政府的党化教育展开激烈的讨论,接着又以社论、专评、来信、建议等等方式对台湾社会的现状及各界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批评和意见。而到1956年10月《自由中国》刊出“祝寿专号”(第15卷第9期),借为蒋介石祝寿之机,集中台岛与海外十多名专家学者的力量,就领导人任期、军队管理、民主监督、司法独立等方面所存在的弊端和问题向政府进言,建议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立法院定期改选,裁减军费,实行军队国家化,反对修改宪法临时条款,解除金融管制,撤销青年反共救国团等等,其涉及的讨论几乎一直指国民党政府的失政之所在。而其中,筹组反对党以及反对蒋介石连任的主张则从根本上刺激了政府对《自由中国》的愤懑,它虽然赢得了台岛及海外民众空前的反响与支持(本期杂志曾被连续再版达十三版),却也为杂志本身带来全面的灾难。《自由中国》与台湾政府终于走向了彻底的对立。

#### 四、最后的辉煌(1956-1960)

自“祝寿专号”出刊以后,以《中央日报》及《中华日报》为首的各级报刊开始全面围剿《自由中国》,有些报章甚至暗示《自由中国》有“通敌惑民”之嫌并要求政府予以强行取缔。面对如此情形,《自由中国》却真正显示了其独立不倚的立场,除了发表《我们的态度》(第15卷第10期)及《我们的答辩》(第16卷第2期)这类“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的申明和回应以外,《自由中国》仍旧继续就政治口号问题(《反攻大陆问题》第17卷第3期)、修宪连任问题(《好一个舞文弄法的谬论》第21卷第2期,《曹丕怎样在群臣劝进下称帝的?》第21卷第3期)及司法滥权问题(《岂容“御用”大法官滥用解释权?》第22卷第5期,《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第22卷第7期)等等,公开发表措辞更为激烈的批

评文章,以全面揭露蒋介石及其政府一意专权、践踏法律的蛮横行为,以至于最终形成了与国民党政权水火不容的对立局面。到《自由中国》开始连篇讨论组织“反对党”的问题时,国民党政府终于以“匪谍罪”的名义正式逮捕了雷震、马之骥、刘子英、傅正等人,雷震与郭国基、吴三连、郭雨新、李万居、许士贤等人筹组“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的努力也遂告失败。《自由中国》被勒令停刊,至此而走向了它的最后终结。

《自由中国》的意识形态诉求其实一直有着实践的 and 理论的两种不同层面的细微差异。就胡适而言,一切钳制人类自由的“非民主”及“非科学”的现象与行为都是必须反对的对象,由此胡适才更为重视人类个体自身在“精神”层面上的绝对自由以及此种自由理念的广泛推播;但在雷震和殷海光等人看来,要实现个体的自由,首先就必须反抗一切来自外部的对于个体自由的压制,具体而言,就是对一切所谓“极权”政治的积极对抗:一面是对于丘吉尔所宣称的以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铁幕”政治的批判——这一点赢得了国民党时政的欢迎,一面同时又针对国民党的在台专权统治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与反省——这就必然地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反感与压制。从《自由中国》杂志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推进来看,真正在理论上的建树其实并不是很大,其具体表现就是,除了胡适、殷海光等少数几位专事理论研究的人物在该刊上发表过一定数量的理论文章以外,充斥于刊中的更多的倒是在自由主义基本理念指导下的有关自由主义政治实践的各种论述,也即大量以引导现有政府改变其当下政治格局为最终目的的“社论”与“政论”。这其中,尤其以关于组织以知识分子为核心主体的“反对党”(1956-1960)以监督和协助现有政府的政治改革的讨论最具影响,其发展顶峰则是雷震以“匪谍案”入狱并导致了《自由中国》杂志的最终停刊。在1950年代的那种特定的冷战环境中,《自由中国》在实践层面上所扮演的似乎一直是胡适所倡导的“政府的诤友”的角色,但可惜的是,当那个尚寄托着知识分子最后的一线政治希望的“政府”已经不再把这群以“诤”为“友”的知识群体当作“朋友”看待时,他们彼

此就将必然地走向其各自的对立面——政治现实将毫不留情地开动其政治机器扼杀这群知识人的政治理想。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胡适才会反复劝说《自由中国》的组织者们要习惯于容忍(这也是导致胡适与《自由中国》同仁们的分歧逐渐加大并由此引发了雷震和殷海光的反对的核心因素),以便尽最大的可能消除与当权者的对抗性紧张关系,从而保存自由主义思想的最后的火种。事实上,这种非激进的自由主义批判立场在以1960年代的《文星》和1970年代的《大学杂志》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身上一直有所承继和保留,这种情形无疑可以看作是《自由中国》之现实批判精神的有效延伸。

自由主义的宪政构想既然带有某种普适性的色彩,它就必然视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单纯的国家主义为其实现的障碍,因此,出现于《自由中国》政论栏目的批判性文字,在表面上是针对种种现实的不合理体制(比如以法令、政策及审查等形式出现的对言论与思想自由的限制)的攻击,其实际希望达到的目的却不只是限于胡适的那种对既有政治体制的修修补补式的改良,而是力图废止一切专权政治以最终实现自由主义宪政理想的根本性的革新。这也使得其所显示出来的“国族想象”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一般范畴而带有了“世界大同”的“乌托邦”性质。尽管如此,在国民党看来,它已经构成了对现有政权的潜在危险,所以对其加以进一步的迫压乃至最终取缔就在所难免了。自由知识分子常常容易自发地生成出某种失家丧国的“流亡意识”,这种意识的优势在于,它可以促使知识分子自身与既有的政治意识形态保持相对的距离(从而消除其政治依附性),而它的潜在危险却在于,这种“流亡意识”一经夸大,就会滋生成为无可着落的飘摇性想象,并最终形成一种对一切都秉持某种“绝对不信任”的“虚无”姿态。《自由中国》在1950年代之所以能相对地凝聚成一个以之为核心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松散群体,关键是由“自由、民主”等等理念所构筑起来的“乌托邦”想象仍旧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知识分子尚有着足够的吸引力,而一旦此一想象破灭,则这个本来就比较松散的群

体就必然走向解体。这可能也是由雷震所主导的“反对党”运动始终无法具有其切实的现实可操作性的另一种深层原因。

《自由中国》所禀承的自由主义有着“五四”传统的延续性,但它又并不单纯是“五四”精神的翻版。一方面,“五四”时期的现代性诉求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批判封建形态的专制主义,而《自由中国》所针对的对象则已经是滋生于“现代”土壤的专制意识形态,这应当是对“五四”精神的拓展;另一方面,作为“五四”传统的直接传递者的胡适,其现实政治策略一直保持着某种温和的“改良”品格,所以在任何时候,他都愿意以既有政治体制的“诤友”的身份而自居,相比之下,《自由中国》的那种渐次高涨的力求从根本上彻底“革新”的“激进”姿态反而更接近“五四”精神本身。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的紧张关系,也许永远都是有待于进一步破解的谜。

#### 【注释】

薛化元:《〈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1950年代台湾思想史的一个考察·第三章》(台北)稻乡出版社1996年版。

雷震:《创刊自由中国的意旨》,《自由中国》第16卷第6期,1957年3月17日。

马之骥:《雷震与蒋介石》,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3年版,第76页。

胡适:《〈自由中国〉的宗旨》,《胡适语粹》(台北)大西洋图书1970年版,第291-293页。

张淑雅:《杜鲁门与台湾》,《历史月刊》第23期,1989年12月,第79页。

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春晖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胡适:《致本刊的一封信》,《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1951年9月1日。

十 作者简介 |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